

新书馆

《对镜》：在文学世界中认识深广的女性价值

——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



张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因为女性文学里，有被忽略的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立场。”在新著《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开篇导读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强调了从女性视角进行文学阅读的重要性。书中，张莉基于女性问题，选择了23篇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细读，既包含对当下热门议题的思考，也涉及女性的传统与女性写作的源流。

经典女性文学在当下女性生存图景中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回响？如何坚守自我，做一名深具独立精神的女性？在推动社会理解女性价值的道路上，文学的意义何在？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与张莉展开了深度对话。

从“自己的房间”到独立的精神家园

记者：在讨论魏微的《异乡》时，您谈到有一个有趣的对照，在伍尔夫的时代，“一间自己的房间”对于女性而言是个奢望，而今，城市里拥有自己房子的女性越来越多。在您的文学与现实经验中，女性对“家园”的理解，百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莉：我认为伍尔夫所谓的房间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讲物质和物理意义上的自我空间，这是女性拿起笔写作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是指一个独立、强大的精神空间。

在妇女解放运动已逾百年的今天，女性独立的物质前提，特别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园，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得到实现，在社会舆论空间里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但是，也没必要强调必须买一个房子才有一种独立生活和写作的自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喻，如果买不了房而只是租来的房间，但依然也可以拥有精神上的“一个人的房间”。

拥有一个忘我投入的工作领域、培育对自我价值的清醒认同，是很多女性对“家园”的新理解。从独立自由的空间开始，进而拥有独立自由的心灵空间，这成为一位独立女性极为重要。当然，女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建立，但无论怎样也有赖于自足的精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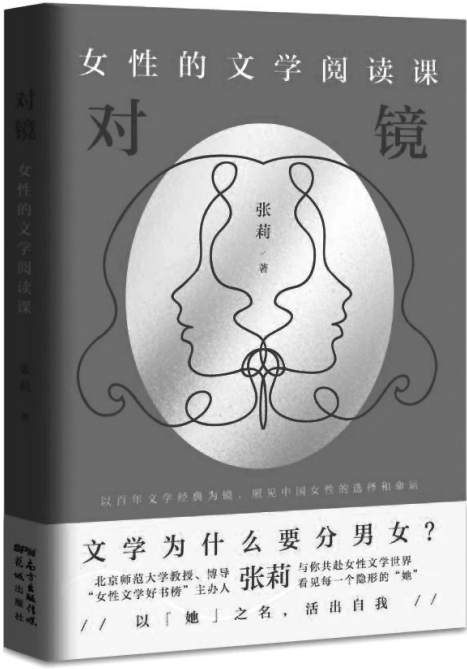
记者：您对散文《女演员》的讨论让我很受震动。散文中孩子对母亲的期待对女性来说，成了比外界目光更沉重的枷锁。您认为，面对“顾家”与“成功”，外界与亲人的多重期待，女性应如何守住自我的精神家园？

张莉：李修文的散文《女演员》中，女演员的孩子看到妈妈不“红”，不相信她病了，却指责妈妈太懒了。女演员被母职绑架了，她深深苦于孩子的期待，不顾一切地去证明自己，直到生命尽头。这部作品让我认识到，我们文化系统对母职的完美期待值得反思。女人不是天生就是母亲，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母亲。

特别是来自孩子的期待和压力，对母亲而言分量格外重。妈妈不能天天要求自己的孩子像别人的孩子一样优秀，同理，一个孩子也不应该要求妈妈成为“别人的妈妈”。所以，在我看来，女性面对最亲密的人带来的压力要有辨析，不能被绑架，主动的沟通和对自我主体性的捍卫特别重要。在沟通中，彼此能更加了解对方的内心，从而逐渐通往真正的理解与尊重，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每个人都在向世界学习。

访谈提示

在新著《对镜：女性的文学阅读课》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基于女性问题，选择了23篇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细读，既包含对当下热门议题的思考，也涉及女性的传统与女性写作的源流。经典女性文学在当下女性生存图景中有哪些值得深思的回响？如何坚守自我，做一名深具独立精神的女性？在推动社会理解女性价值的道路上，文学的意义何在？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与张莉展开了深度对话。



好的爱情只关乎爱本身

记者：发表于1989年的《遭遇礼拜八》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离异女性的深刻偏见。而今天的网络语境中，另一种偏见指向了“不离婚的女人”。婚姻出现问题的女明星未选择离婚，有时会被指责不够独立。您如何看待女性婚姻选择面临的“两面夹击”？

张莉：首先，铁凝的《遭遇礼拜八》反映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文化土壤，即把离婚的女人看作是抛弃的，这种观念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失。

当然，你说的“两面夹击”也存在。我想，一个女性离不离婚都有她的自由，社会要宽容。作为女性本身，不能被他人的目光绑架。不能讨好别人生活。我想说的是，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坦然做自己恐怕是最重要的。当然，做自己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扰。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作生活中的镜子，镜子中的她们，有比我们完美的地方，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我们看她们，不是赞美或批评，而是以之为一面镜子，成为自己。作为读者，要辨析地去阅读，最终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我希望大家一起阅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看到复杂的、完整的生活和人性，对他人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性的理解。同时，也将这些文学中的女性视为姐妹和朋友。当我们遇到困难和困扰的时候想到她们，那些爱情中的女性，那些家庭中的女性，那些遥远之地的女性，和她们一起互相陪伴，共同成长。

记者：《对镜》中的爱情、婚姻主题小说呈现出了人的主体性、爱情的自主性与文化规训、社会偏见间的复杂张力。今天，影视剧等大众文化中失真的“浪漫爱”或“狗血爱”，有时成了女性追寻爱情路上的障碍。在您眼中，文艺作品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好”表达是怎样的？

张莉：小时候我们或许也向往过“浪漫爱”，也为“狗血爱”控制过，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女性也会自我觉醒，逐渐成长，会警惕物化自身的爱情，也会不断认识到爱情的复杂样态。《对镜》中，我分析了许多关于爱情中的女性的作品，例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不屈从他人目光的爱，《我爱比尔》里迷失自我的爱，《高女人和矮丈夫》里看似“不般配”的高贵爱

情，《亲亲土豆》里清贫夫妻生生不息的爱。

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好的爱情表达只关乎诚挚和快乐，只关乎爱本身，与人的年龄、贫富、身份无关，其实，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带大家找回关于爱的常识。曾经有学生问我那个网络上早年流行的问题——“你愿意在宝马里哭，还是愿意在自行车上笑？”我们还特意为此聊了一会儿，当然聊得很开心。我的回答是，宝马和自行车不是衡量爱情的标准，爱情中是哭或是笑，与骑自行车还是坐宝马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选择，那么重要的不是宝马或自行车，重要的是爱，重要的是笑。

重思女性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记者：从关于母亲或女性祖辈的文学书写中，我们看到，代际影响深刻地塑造着女性的自我理解。张爱玲笔下的母亲是“暗黑”的，邵丽笔下的母亲是“躺平”的，乔叶笔下的老祖母是复杂而温暖的。在您看来，思考不同代际女性的生命交集，在当下有怎样的价值？

张莉：不同代际女性的生命交集首先让我们看到了深厚的女性情谊。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透过祖母，写出了20世纪中国女性生命中的种种遭际，以及孙辈重新理解老祖母的历程。祖母的形象是复杂的，一方面有着浓重的封建思想，一方面又抱有对女性晚辈的疼惜和支持，这是一种宝贵的女性情谊。我们经常看到小说或是影视剧里将女性间的关系书写为天生的仇敌，因此，重新发现女性生命经验的联结和支持很重要。最近，我主编的散文选《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也已出版，聚焦的就是20年来女性的生命轨迹，其中也写到了普通人之间女性情谊的宝贵。

而邵丽的《风中的母亲》里，出现了一位我们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很难见到的、新鲜的母亲形象。她不是完全牺牲型、奉献型的母亲，她是努力做自己的母亲，看起来有点儿“躺平”的，但她的孩子成长得也很好。这样的母亲不是模范母亲，但文本为我们呈现了母亲的多样性。

实际上，从近年来热议的社会话题中，我也看到，整个社会已经开始了对传统母职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孩子的教育，家庭的幸福，不只是母亲一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件好事。

记者：李娟的散文《我的阿勒泰》让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女性生活世界和写作方式。您认为，在推动社会“确认常识”、真正理解女性的道路上，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意义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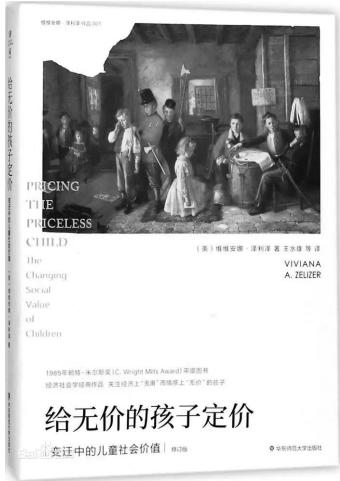
张莉：我们印象中的女性文学，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去理解世界。李娟却不止步于此，而是将目光投向阿勒泰更广袤的背景，把人或女性的生存放到与自然的关系中去思考。我非常欣赏李娟的写作，我认为她拓宽了我们对女性写作的理解。

女性文学不拘泥于某种内容或程式，而是一种女性视角。女性视角通常是边缘的、弱者的、被忽略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会让我们看到更丰富的世界和人性。这是我做女性文学研究的初衷。另外，我也强调女性视角的阅读。你看，很多文学作品本身未必是女性立场的，但我们可以尝试从女性视角去理解它。例如，《简·爱》不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但我们如果看到阁楼上的疯女人，就会看到当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又如，假如我们从祥林嫂的视角去读鲁迅的《祝福》，其实也可以看到祥林嫂对不公命运的奋力抗争。

女性文学是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也为我们提供能动地认识世界的方法。阅读文学，特别是阅读那些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品，能够推动我们理解女性的价值，也会帮助每个人重新理解世界。理解的同时，我们会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努力去做改变，由此，我们会变得更强大、更有力量。

阅读提示

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兴起，学者们试图以跨学科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生活。《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运用将定量数据与历史事实结合的方式，通过考察文化因素在重新定义美国儿童价值中的作用，将文化因素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论证了市场的局限性，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馨予

自经济学边际革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相互漠视，互不干涉对方的领地。通过将文化、情感等非经济因素排除在外，经济学不断强调自身的客观、理性化，从而与社会软科学分离开来。这种隔阂到1950年代后期，因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涉足传统社会学领域而有所松动。但在维维安娜·泽利泽看来，这种学科间回归于好的可能性被挥霍了，经济学家只是通过拓展新疆域来检验自身原有的范式，而社会学家中的很大一部分则彻底与新经济社会学站在了对立面。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热潮兴起，学者们试图通过网络、市场、企业、性别、文化五个层面的研究，以跨学科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生活。其中维维安娜·泽利泽对人身保险、儿童的社会价值以及货币的特殊形式三个主题的研究，在文化研究层面颇具代表性，其《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通过考察文化因素对美国儿童价值重新定义所起的作用，将文化因素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论证了市场存在的局限性。

神圣的儿童：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在19世纪之前，美国小孩一经断奶便被要求模仿着大人的言行举止，与大人们一同劳动甚至竞争，童工普遍存在。中世纪以后，社会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以对儿童保护、教育为核心的家庭观逐渐发展起来，“神圣的儿童”由此诞生并扎根于西方现代思想中，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随着儿童生命的神圣化，过早的参与劳动被童工改革者定义为对儿童情感价值的侵害。在此之前，儿童劳动一直都是“处于经济压力下的城市家庭额外支撑的主要来源”，在一个爱尔兰裔家庭，儿童甚至能贡献全部家庭劳动收入的38%到46%。童工非法化不仅意味着一个家庭要放弃部分可观的收入，还意味着父母要承担孩子从出生到成年所需的接受教育等的一切费用。

经济学家指出，“养儿防老”的投资观念已落后，父母养育孩子的成本可能远高于收获的利润。而父母们愿意负担这样的成本可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打算，而是情感上的考虑，这恰恰打破了经济学家所坚持的“个体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者”的观念，成为论证市场局限性的有力证据。

无价与定价：儿童死亡赔偿的悖论

在儿童这一特殊年龄段被从人生阶段中分离出来之前，其意外死亡的赔付与成人是类似的。然而随着儿童价值在社会公众观念中的变迁，这类赔偿的判决愈发起引起公众的愤怒，“儿童+劳动力”的公式被逐渐否定，如何给无价的儿童定价成为现代法律中一个敏感而模糊的难题。

在多个几美元甚至1美分赔偿的案件引发群体性愤怒后，法官们逐渐意识到儿童死亡案件的特殊性，情感价值应该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法官们开始倾向于认为，儿童带给家庭的情感价值是无价的，精神损失费成为受害父母的合理诉求。

在这类法律案件的争论中出现了个难以厘清的矛盾，受害儿童的家庭被认为遭受到了金钱不能弥补的情感伤害，但当他们向法院提出索赔时，儿童无价的生命和其带来的情感价值又变成了一般等价物。许多人争议道，儿童遭遇死亡的时刻似乎成了儿童被商品化的时刻，但这恰恰又一次证明了市场的局限性。

买卖与伤害：儿童保险与领养市场的变迁

在20世纪以前，美国未婚先孕的母亲通常需要花钱来“处理”无法抚养的孩子，而1950年，渴望孩子的夫妻可能要花费10000美元到黑市购买一个别人的孩子。出生率降低，市场供不应求并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化，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

关于领养的核心争议仍旧是儿童的商品化，必须思虑的问题是代养者或者领养者究竟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量来抚养一个儿童？与此相似的是儿童保险的盛行。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儿童保险在劳工阶层获得重大的商业成功，但儿童救助者则宣称这是道德的沦丧，保险公司在其口中成为一些贪图儿童保费的父母的同谋者。在这样的指控下，保险代理人开始承担社会工作者的职能，如发放指导父母正确关爱孩子的手册、派护士前往照看生病的孩子等，保险公司甚至成了延长儿童生命的活跃角色。时至今日，父母为孩子投保已经成了“期盼孩子活着”的父母之爱的象征性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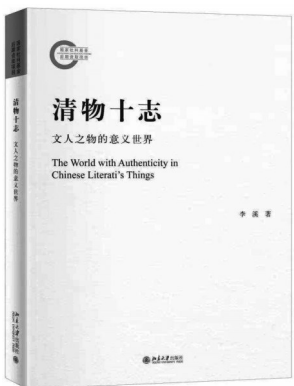
保险能够通过转化象征意义从而获得成功，但领养、代养标准的衡量则更为困难。专家又开始担忧领养者有“寻求从儿童身上补偿落空的情感”的危险。在20世纪儿童观念变化的影响下，美国市场导向的运营者不得不开始根据非利润的标准来评判儿童“出售”的问题，这是市场局限性的又一力证。

可以说，无论是童工、儿童死亡赔偿、保险还是领养争议，都是基于“儿童的情感价值和功利价值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的观念假设，而这一观念正随着儿童世界的不断变化被逐渐修正。作者预测，儿童的家庭职责、经济价值都将随着家庭结构和新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而被重新界定，在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价格、市场等将持续受到价值转化的影响。

总体而言，《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虽然没有从更根本的层面揭示儿童生命神圣化的动因，但作者仍通过将定量数据与历史事实结合的方式，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

《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



李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今天人们对文人之物总有一种闲雅自然的印象，其实，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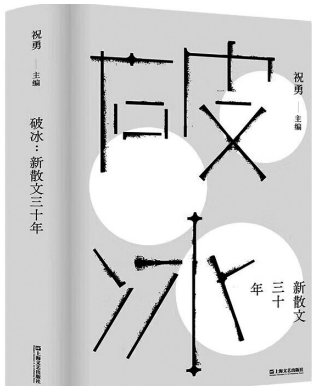
们的诞生，皆曾经历过文人长久而艰辛的漂雪。本书选取了文人生活中的十种物，讲述了文人如何在诗文、绘画以及日常之用中，逐渐荡涤掉物身上沾染的权位和时俗之“浊气”，还物以一个清冷澄澈的本真面目。在这个文人所建立的意义世界中，物的面孔或许是无用的、丑怪的、斑驳的、平淡的，但这正意味着它们脱离了一切名利之心和世俗成见，终以独我的姿态在天地间现身了。文人对物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在诉说他们自身。比起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这些物的意义都更为坚实、笃定、永恒。因此，他们常说，唯有这些物，才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更易的“知己”。

《破冰：新散文三十年》

祝勇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本书是由祝勇主编的一部献给“新散文”三十年的纪念集，收录钟鸣、于坚、冯秋子、宁肯、张锐锋、蒋蓝、祝勇、周晓枫八位“新散文”代表作家的代表篇目，以此描摹“新散文”创作三十余年的吉光片羽。

“新散文”深深根植中华大地，行走于华夏自然山川，跋涉于社会现实生活，在“新散文”里，我们看到孔子、庄子的影子，也看到到卡夫卡、博尔赫斯、曼德尔斯塔姆的影响，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们复杂、迷离的主体世界。“新散文”褪去了当初的新锐青涩，成长为



一个强大的精神主体，生成了一个具有超大能量的内宇宙，代表着一种新的观念、方向、高度，是中国散文通向未来的道路，也是中国文学在经历先锋文学的青春冲动之后的一次再出发。

（崔安琪 整理）